

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论卡利尼科斯的四重批判

□刘明明

[天津大学 天津 300072]

[摘要] 在资本主义逻辑横行的西方世界,质疑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并非潮流。苏东剧变后,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已不再是学术探讨的主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完善资本主义体制。卡利尼科斯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从四个方面挑战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一是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二是危及人类生存的生态问题;三是频繁爆发的冲突与战争;四是日益严重的贫穷与不平等。这四大问题的存在构成了反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缘由,表明了资本主义不再可期和可欲。卡利尼科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力地回击了资本主义“历史终结论”,也有利于帮助人们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

[关键词] 卡利尼科斯; 资本主义; 批判; 经济危机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4071/j.1008-8105(2016)04-0053-06

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无疑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它不仅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而且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下来,废除了封建社会时期那种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但资本主义的进步具有相对性,远非像资产阶级右翼学者所鼓吹的那样是“历史的终结”。在当代英国著名的左翼学者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看来,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不断吞噬着它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日益严重的气候问题成为悬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频繁爆发的冲突与战争使得生灵涂炭,日益严重的贫穷与不平等导致哀鸿遍野,这一切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本文将就卡利尼科斯对资本主义的四重批判展开分析,以帮助人们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

一、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

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后,经济危机就如同幽灵般飘荡在资本主义世界,频繁发作,比较大的经济危机有1857年经济危机,1929~1933年经济危机,1973~1975年经济危机,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等。自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的周期明显缩短,对经济的影

响和危害也加重。在卡利尼科斯看来,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利润率降低。他的分析具体如下:

首先,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少数人支配多数人的阶级社会,资本家雇佣工人的目的是追逐利润。

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资本家会雇佣工人?是出于他们心肠的仁慈吗?卡利尼科斯认为,资本家之所以雇佣工人,是因为他们依赖工人获取财富。他指出:“从资本家的立场来说,工人拥有特殊的优点,他们可以生产比雇佣他们所花费的价格更多的价值。例如,一个工人可能花费四个小时生产相当于他/她日常工资的价值。但如果他/她每天额外工作四个小时,那么在这期间所生产的就是资本家的纯利润。”^{[1]13}正是“剩余价值”构成利润的最终来源。所以,资本家的财富源于对工人的剥削,源于工人被迫为资本家工作的方式——他们不仅要偿还资本家所付的工资,还要为资本家创造利润。卡利尼科斯指出,这正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通过对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揭示,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认为资本家和工人享有共同的利益,认为他们在同一条船上,认为有某种“国家利益”将他们团结在一起,这是极其荒谬的。实际上,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资本和劳动之间根本的利益冲突,

[收稿日期] 2015-05-11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市场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及其当代启示研究”(TJKS15-005)。

[作者简介] 刘明明(1986-)男,法学博士,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而不是利益的契合。

其次,资本家追逐利润是资本主义竞争机制的结果,为了避免被竞争对手淘汰,他们将所得利润不断再投资于生产中。

卡利尼科斯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建立在为利润而生产的基础之上的经济制度。但是,有两个更重要的问题:一是资本家为什么对利润如此感兴趣?二是他们用利润去做什么?在卡利尼科斯看来,不是因为资本家贪婪,想将利润花费在葡萄酒、女人和歌舞等方面。事实上,大多数利润不会被资本家以较高的生活享受挥霍殆尽,而是会被重新投资于扩大再生产。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积累”:利润被从工人那里压榨出来,目的是使其自身投资于榨取更多的利润中,这些利润反过来被用于再投资。换言之,就是为了生产而生产。为什么会如此?卡利尼科斯强调,最主要是因为这一体制的压力:“资本主义是一个竞争性体制。任何单个资本家都不可能控制经济,而是许多不同的资本家为了争夺市场而彼此竞争。正是他们的经济对手强迫资本家们不断去积累,将利润用于再投资。”^[114]由于拥有最低成本的资本家可能会控制市场,因此,每个资本家必须投资于机器的改进,这将提高其所雇工人的生产率,从而让其获得相比于竞争对手的优势;而任何一个落后的资本家将最终被淘汰出局。所以,竞争的压力迫使资本家去积累。

第三,竞争除了使资本主义成为一个极其有活力的经济制度之外,它还是经济危机的祸源。

卡利尼科斯指出,竞争导致资本家为提高生产率而将他们的利润再行投资出去,以此作为削减成本的一个手段。现在,更高的生产率意味着,每个工人可以调动的厂房和设备的数量增加了。从一个抽象的角度来看,这不是坏事,因为它意味着生产同样一件商品所需的人类劳动越来越少了。“但是,这一发展给资本家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因为这意味着,他必须为其雇用的每个工人花更多的金钱用于厂房和设备。但是,工人是资本家利润的来源——他/她的劳动生产出高于他/她的工资的剩余。因此,投资成本的增长快于榨取自劳动力的利润的增长。换句话说,资本家从他的投资中获得的收益——利润率——下降了。”^[115]卡利尼科斯指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它是资本主义运行所固有的一个过程。吊诡的是,作为利润率下降后果的经济危机却具有修复利润率的神奇功能。经济衰退时期,许多资源处于闲置状态:其中一些是属人的,如工人被解雇,学校毕业生直接成为失业人群,其他则是属物的,例如工厂关闭,机器生锈。所以,

产生了巨大规模的浪费。卡利尼科斯指出:“非常荒诞的是,这一浪费对资本主义的制度非常有用,因为它允许一种将利润率恢复到令人满意的水平的经济重组。失业的压力迫使工人接受更低的工资和更糟糕的工作条件;而规模较小、缺乏效率的资本家破产,幸存的资本家可以大量买进他们便宜的厂房和设备。这会继续下去,直至利润率上升到一个资本家认为‘合适的’水平。当这一点达到时,他们就准备进行投资:工人被雇佣,有更多的钱流通,因此对商品的需要上升,而经济开始好转。这会继续下去,直至我们有一个繁荣并且整个循环周期再次开始。”^[116]

第四,经济衰退不再是修复利润率的灵丹妙药,经济衰退的克服变得愈发艰难。

卡利尼科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衰循环不会永久地持续下去,因为资本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由于竞争,资本家变得越来越强大,一百年前成千上万的小个体雇主被现在的大型跨国集团所取代,而这种公司通常为国家所有,像法国雷诺公司、英国石油公司、英国利兰汽车公司等。公司规模扩大意味着破产成为一件更为严重的事情:一百年前一个个体雇主能够在没有破坏国民经济的情况下破产,但在今天1000家大型公司支配英国经济(所有发达的工业国家也是如此)的情况下,这种情形早已不再,因为如果这些企业中的相当数量破产,那么整个国民经济将遭受重创。据此,卡利尼科斯推断指出:“不管什么颜色的政府都会将金钱注入难以为继的企业。玛格丽特·撒切尔大规模地资助英国利兰汽车公司,而罗纳德·里根支持克莱斯勒,即使这违背了他们所有的经济原则。在1984年,‘自由市场’的里根政府实际上走得甚至更远,当其中一个最大的美国银行(伊利诺大陆银行)破产时,美联储为阻止一场金融恐慌而介入进来,并且实际上将这家银行国有化。”^[117]政府对行将破产企业的拯救使得经济危机不再扮演修复利润率的角色。只要低效率的企业足够庞大,就不会被摧毁,而会继续运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充斥着许多低效率的资本。卡利尼科斯强调,经济危机无法承担修复利润率和摧毁低效资产的角色导致通货膨胀的持续存在:过去,价格在繁荣时期上升而在衰退时期下降,而现在它们则一直上涨。衰退不会消除通货膨胀,而只会减缓价格增长的速度。

经济危机的频繁发作,以及爆发后的旷日持久和破坏性后果,都在挑战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所以,在卡利尼科斯看来,只有通过废除资本主义

并且通过一个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取而代之,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的无政府性。

二、危及人类生存的生态问题

在卡利尼科斯看来,正是资本主义的竞争性积累所导致的利润率下降,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是,竞争性积累的原理没有仅限于经济领域,它还在其他领域发挥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然环境领域。

迈克内尔(McNeill)将前苏联发生的环境灾害归结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卡利尼科斯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很早就预见到了环境的报复问题,并引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著名段落为证:“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383-384}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强调人类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但并没有忽视自然的先在性及其对人类的制约性。所以,将前苏联破坏自然的行为归结于马克思主义显然是没有道理的。真正的原因在于前苏联面对激烈的内部冲突和地缘政治竞争压力,不仅得不到西方的援助,反而遭受来自西方的武力威胁,所以,除了向自然过度索取资源外,别无他法。

在卡利尼科斯看来,大多数破坏自然的行为产生于资本积累的逻辑,不管它是发生在前苏联,还是西方国家。根据迈克内尔的划分,人类社会依次经历了早期的工业群、焦炭城工业群、汽车城工业群和新式工业群。卡利尼科斯认为,后两种工业群是当代人类社会的主流产出形式,它们正在破坏生态环境:一方面汽车城工业群虽然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但是它并没有成为遥远的过去。“恰恰相反,巨型的化石燃料企业——那些支配世界石油、天然气、煤炭、汽车、公路建设、橡胶工业的公司——代表了强势社会群体的经济利益。在强烈反对1997年日本京都议定书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后,美国的化石燃料公司又成功地支持了总统候选人乔治·W·布什,后者入主白宫后的首要举措中就包括了对1997年日本京都议定书的指责。美国国

会对安然丑闻的调查暴露了公司如何通过关闭工厂,出口电力,控制缺少政府管制的加州能源工业,人为制造能源短缺的假象,哄抬价格以牟取暴利。安然和其他能源供应商还参与了‘来回转帐(round-tripping)’诈骗——一种可以虚增营业额,抬高价格的欺骗性销售。布什政府抓住由此导致加州能源危机的机会,呼吁放松对太平洋西北地区石油钻探的环境管制。”^{[3]24-25}另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可能已经形成的以基因工程技术和信息科技为核心的新式工业群对人类的生态环境来说也不容乐观。卡利尼科斯特别对基因技术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指出:“由‘五大基因巨头’——阿斯利康(Astrazeneca)、杜邦(DuPont)、孟山都(Monsanto)、诺华(Novartis)和安万特(Aventis)统领的大批跨国公司正在借助最新科技大规模引进转基因有机体。他们的行为会引发难以预测的,并且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后果,包括过敏性食物的扩散、物种对抗生素的抗药性的增强和新式病毒的产生。生物公司对控制整个食物链的无耻欲望通过其研发的‘终结者’技术表现得淋漓尽致。‘终结者’技术使得用转基因种子培育出的植物体失去繁殖功能,于是农民们不得不永远依赖于种子的供应商。”^{[3]25}

在竞争性积累的机理作用下,每个资本家为了避免被竞争对手淘汰出局,会研发并应用新的技术,而不管该技术的环境影响;会利用自然界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而不会顾及生态平衡问题;会尽可能地降低排污成本,而不管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会尽可能地推出高收益的产品,而不管该产品的回收难易度和潜在的环境污染。卡利尼科斯认为,即使是人类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在自然科学的帮助下,能够去修复由他们自己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这一过程也会受到如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极大抑制,因为它鼓励运用科学知识将物质世界变得完全可取代和使用。卡利尼科斯担心道:“一旦陷入无休止的竞争中,资本家们的行为就预示着恐怖的星球灾难的到来。”^{[3]26}他援引苏珊·乔治的警示语做例证:认为跨国公司和富裕国家在最终意识到它们将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声明时会改变它们的行为是荒诞的,即使它们为了自己子孙后代的未来,想要停止下下来,也身不由己;资本主义就像是出了名的自行车一样只能前进,否则只能倒下,而企业的竞争不过是要看看谁在最终撞墙倒下之前冲得更快^{[4]50}。

总之,在卡利尼科斯看来,主宰当今世界经济的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是导致环境破坏过程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这种竞争威胁到了人类和许多其他

物种的生存。而当一个制度与人类的生存相冲突时,人类还有什么理由不反对它吗?

三、频繁爆发的冲突与战争

卡利尼科斯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的第三个严重缺陷是频繁爆发的冲突与战争,这背后既有经济竞争的因素,也有地缘政治的作用。

冷战结束以后,两大集团对立的局面被打破,但并不意味着世界就此迈入了太平盛世。对于目前的形势,卡利尼科斯指出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由于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分裂,以及自身庞大的经济规模和较高的技术水平,美国对其他大国的军事领导极度膨胀。二是美国历届政府都竭尽全力确保美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的领导地位,并抑制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美国的政治挑战者,例如,克林顿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发动巴尔干战争,实际上就是为了确保美国在欧洲大陆的政治和军事的领导地位。三是当前的各种趋势表明,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这两条主线可能不久将在中国汇合。理由是:快速的经济增长足以把一个已经是地区性强国的国家变成一个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挑战者^{[3]34-35}。也就是说,美国力图在军事、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确保自己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全面优势,而其他国家又不可能在这些领域停滞不前,也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接受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这些国家不仅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也包括欧盟和日本等国家,所以冲突并没有消失,相反,霸权与反霸权之间的博弈,霸权国家与所谓“邪恶轴心”国家之间的斗争会愈演愈烈。美国在“9·11”事件后的反应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卡利尼科斯指出,“9·11”事件后,美国针对阿富汗境内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据点的军事打击,除了消除美国本土受到的有形威胁外,还要向俄罗斯、中国等潜在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表明,对美国地位和利益的攻击将会有怎样的下场。而且不久之后,乔治·布什将反恐战争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他指出,美国不仅要直接打击恐怖主义网络,还要防止恐怖主义的支持者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美国及盟友的安全,并将伊朗、伊拉克、朝鲜、利比亚、叙利亚和古巴等国家列入敌对国家。有学者就敏锐地指出,所有的迹象都在表明美国政府正在以“9·11”事件为契机推行其野心勃勃的新外交政策^{[3]38}。这种政策的最终目的不是一场反恐战争,而是利用自身强大的军事优势巩固其在全球的统治地位,以防止在未知的将来出现另一个全球性的竞争对手。正如卡利尼科斯所指出的,“美国政府感到来自伊拉克

那些弱小国家的威胁,而伊拉克从某种意义上说则代表了像中国那样更加严重的潜在对手”^{[3]39}。透过美国政府对潜在的地缘政治对手的担忧,我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的竞争性积累机制也是诱发国家间地缘政治对抗和武力滥用的罪魁祸首。

为美化其对外战争,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常借人道主义之名。对此,卡利尼科斯指出:“人道主义干预的教义——它主张严重的人权迫害足以合理化对国家主权的践踏——需要被相当审慎地看待”^{[5]93}。综观世界政治发展史,强国一直主张它们拥有干预小国事务的权利,只不过在每个时期或阶段的托辞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在两种意识形态对抗的冷战期间,遏制共产主义的扩散会成为美国政府干预行动的理由,维护社会主义体制会成为前苏联干预行动的借口。冷战结束后,美国为其践踏他国的国家主权找了一个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为了避免人道主义灾难。他们呼吁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原则:国家内部的人民群众遭受消灭或驱离可以作为国际干预行动的正当理由。无疆界医生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就坚决主张,不管当地政府是否愿意,这些组织都拥有为这些灾难的受害者提供救济的权利,并且它们要求西方国家对其行动提供军事保护,以支持这项权利。而部分国家和地区发生的种族灭绝事件和饥荒,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条路线的可信性。但是,卡利尼科斯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挥舞的人道干预大棒奉行双重标准,对美国本身在越南等国家造成的人道灾难视而不见,只是有选择性的针对某些特定国家,如南斯拉夫。他强调指出:“当代的人道主义干预完全无法超越现实政治,反倒成为它的一个工具”^{[5]95},这突出表现在慑于俄罗斯强大的核武库,他们对该国在车臣发动的残暴战争视而不见。因此,人道主义干预的标准不在于是否真的产生了人道主义灾难,而是侵犯人权的国家是否拥有核武器。根据卡利尼科斯的这一论断,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伊朗、朝鲜等国家要不遗余力地发展核武器。

面对动荡的世界和频发的战争,卡利尼科斯忧心忡忡地指出,世界正在变得危机四伏,而罪魁祸首就是资本主义。

四、日益严重的贫穷与不平等

卡利尼科斯在其著作《平等》一书中对资本主义世界中存在的贫穷和不平等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他主要从整体世界和发达国家两个视域来观察这一问题。

一是整个世界充斥着不平等。卡利尼科斯指出,前人怎么也想象不到世界进入21世纪后会充斥着贫穷与不平等,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的《人类社会发展报告》,世界上最富裕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与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之间的比率从1960年的30:1,增长至1990年的60:1,到1997年这一比率增长至74:1。将这一报告中超级富豪的财富增长情况与世界其他人口相比较会形成极为悬殊的反差,卡利尼科斯阐述道:“在1994~1998年间,世界上最富裕的200人的净财富翻了一番还要多,从4400亿美元增长到10420亿美元:后者的总和相当于全球41%的人口的总收入。而在同一时期,每天不得不依靠不足1美元来维持生活的人口数量没有改变,仍然保持在13亿。在这些富豪中,比尔·盖茨、沃尔顿家族(沃尔玛超市连锁的所有者)和文莱苏丹的财富相当于世界上36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总和。”^[6]

二是发达国家内部的贫穷与不平等现象严重。卡利尼科斯指出,在发达国家本身中,贫富之间的差距一直不断拉大。他援引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在《涡轮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赢家与输家》中的段落:“少技能人群的进一步贫困化,意味着美国也在逐步走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收入分配特点了。即顶层占总人口1%的是富豪,而另一头,少数人的生活(大约占12%)明显处于贫困线以下,尽管他们是充分就业的,一周工作40小时,一年工作50周。以纽约州为例,经济很有活力,非常地涡轮资本主义化(毕竟,华尔街就在该州),该州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超出全国的平均状况。1996年,占家庭总数1/5的最富裕家庭,每户年收入高达132,390美元,相当于1/5最穷的家庭收入6,787美元的20倍。华盛顿特区悬殊更大,相差28.2倍。全美国的平均数是:富裕家庭年收入117,499美元;贫穷家庭年收入9,254美元,相差12.7倍。纽约州,顶尖1/5的家庭的年收入从1976年到1978年间,又增长了46%;而最穷的1/5的家庭实际下降36%。”^{[7]85-86}英国追随美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走向了解除控制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道路,它也呈现出同美国类似的不平等状况。根据英国工党政府的一项调查,以基尼系数来测算英国收入的分配不平等情况,在1977年至1996~1997年间,该系数增长了1/3。这主要反映的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工资差距——对男性来说,前十分之一的劳动力的工资增长速度是后十分之一劳动力的两倍,对女性来说,则是4倍——以及失业家庭的比例从1979年的9%增长至1995~1996年的20%^[6]。

因为卡利尼科斯写作《平等》一书的时间比较早,所以,书中的数据资料都略显陈旧。但卡利尼科斯所得出的结论并没有过时,可以通过2013年的一项调查得到揭示:“全球最富有的200人拥有大约2.7万亿美元的财富,远远多于35亿最穷人口2.2万亿美元的财富总和……乐施会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最近20年,1%最富者的收入增加了60%,金融危机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加速了他们财富的增加,其中0.01%最富者的收入增长最快’……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在殖民统治时期,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已从3:1扩大到35:1,部分原因在于欧洲列强以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形式从南方国家掠夺了大量财富,而现在这个差距已经扩大到将近80:1。”^[8]

在卡利尼科斯看来,资本主义与平等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内实现社会公正无疑是天方夜谭,“要实现平等主义的公正,只有走反对资本主义的道路”^{[9]158}。

五、结语

通过卡利尼克斯的分析可以发现,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着四大问题的困扰:金融危机,环境破坏,战争冲突,不平等和贫穷。资产阶级学者极力想撇清资本主义制度与这四大问题的关系。对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他们否认其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内在联系,而将危机的产生归于其他一些偶然或外在因素,如金融家的贪婪、过度的投机行为、银行监管制度的缺失和公众消费信心不足等,更有甚者竟荒谬地把危机归咎于美国人的消费方式加上中国的货币汇率^[10]。对于环境破坏,他们诉诸于前苏联和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严重污染问题,以此为资本主义洗脱罪名,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环境破坏,也就证明了环境破坏与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关系。对于频发的战争,他们否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过错和责任,认为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外发动战争的目的是维护世界和平,是为世界清除掉“邪恶轴心”等不稳定因素。对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不平等和贫穷,他们认为是因为在贫困国家和地区新自由主义政策被贯彻不够彻底。通过资产阶级右翼学者冠冕堂皇的解释,我们似乎不应该向资本主义制度泼脏水,不应该将这些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想象在一起。但是,卡利尼科斯透过表象看到了这些问题背后的缘由,即资本主义竞争性的资本积累。金融危机是资本积累导致利润率下降和生产过剩而产生的危机;环境破坏是资本家为竞争而削减成本的结果;战争除了地缘政治的考虑,最重要地是为了经济利益服务,是为了本国的资本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Aug.2016,Vol.18,No.4

家开拓新的赢利场所;不平等和贫穷是因为资本积累导致财富和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结果。在卡利尼科斯看来,更严重的是,环境问题和核战争有毁灭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的可能,这是它失去合法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缘由。

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空前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它不仅在短时间内使人类从两次世界大战的衰败中恢复过来,并走向繁荣,而且在与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的角逐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些成绩都很容易使人们对资本主义顶礼膜拜,将资本主义与永恒合理性联系在一起。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苏东剧变,更是被西方右翼学者普遍解读为资本主义胜利和社会主义失败的标志。面对这种情况,身在资本主义阵营的卡利尼科斯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判,这些犹如清醒剂一般警示人们:资本主义绝不是人类未来的希望,也不可能是历史的终结;如果人类不掉转发展方向,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很可能将整个个人类终结。当然,我们不可能强求卡利尼科斯的批判理论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他的批判理论的确有力地回击了资本主义的必胜论,证明了资本主义不是人类的福音,他的反叛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总体而言,卡利尼科斯的批判理论切中了资本主义的要害,使人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贫穷、社会上的不公正、经济波动、环境破坏、战争,来自同一个根源——资本主义制度。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采用激进的方式”^{[3]40}。

从而最终有利于帮助人们破除对资本主义的迷信,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参考文献

- [1] CALLINICOS A. The Revolutionary Road to Socialism [M]. London: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1986.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 [3] 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 反资本主义宣言[M]. 罗汉, 孙宁, 黄悦,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 [4] CALLINICOS A. An anti-capitalist manifesto[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
- [5] CALLINICOS A. Against the third way: An anti-capitalist critiqu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 [6] CALLINICOS A. Equalit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 [7] 爱德华·勒特韦克. 涡轮资本主义:全球家经济中的赢家与输家[M]. 褚律元, 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0.
- [8] 参考消息网. 外媒: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引入 [EB/OL]. (2013-08-08). <http://finance.cankaoxiaoxi.com/2013/0808/252330.shtml>
- [9] 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 平等[M]. 徐朝友, 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 [10] 红旗文稿编辑部. 深刻剖析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 进一步认清当代资本主义本质——汝信、周新城、杨承训访谈录[J]. 红旗文稿, 2010(19): 10-13.

Legitimate Crisis of Capitalism: On Callinicos's Criticism from Four Aspects

LIU Ming-ming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In the western world where the logic of capitalism prevailed, challenging the legitimacy of capitalism was not a trend. After the collapse of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western scholar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legitimacy of capitalism was no longer a theme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e key question lied in how to perfect the system of capitalism. Callinicos had a different opinion, he challenged the legitimacy of capitalism from four aspects: the first one was the protracted economic crisis; the second one was the ecological problem which endangered human survival; the third one was the frequent outbreak of conflict and war; the fourth one was increasingly serious poverty and inequality. These four major problems constituted the basic reason of the anti-capitalism, which showed that capitalism was no longer expectant and desired. Callinicos's criticism of capitalism effectively counterattacked “the end of history”, and it also helped people to recognize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

Key words Callinicos; capitalism; criticism; economic crisis

编辑 邓婧